

简论西南丝绸之路

方铁

(云南大学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西南丝绸之路大致有成都经今西昌、大理入缅甸至印度道,成都经今大理入缅甸沿伊洛瓦底江出海道,成都经今宜宾、昆明、蒙自至越南北部出海道3条路线。中国历朝重视经营西南丝绸之路,尤以汉、唐、元三朝为最。统治者注重西南丝绸之路,初衷是为海外诸国朝贡、相互遣使以及对外用兵提供便利。随着商品经济渐趋活跃,该路成为重要的国际商道。

关键词:西南丝绸之路;中原王朝;朝贡;国际商道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5)03-0114-07

“丝绸之路”是对古代中国与地中海地区之间国际交通线的俗称,因商品中有宝贵的中国丝绸而得名。其走向包括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又可细分为西南丝绸之路与岭南丝绸之路。本文主要叙述西南丝绸之路。

一般认为西南丝绸之路始于先秦,其利用的高潮在汉唐时期。西南丝绸之路始于成都平原,南下大致有3条干线,第一条经今四川西昌、云南大理、云南德宏入缅甸北部,经过今印度北部辗转达地中海沿岸,可称“成都经西昌、大理入缅甸至印度道路”。第二条经今四川西昌、云南大理、云南德宏入缅甸北部达杰沙(元代称江头城),走水路或陆路沿伊洛瓦底江至孟加拉湾出海,再转达地中海沿岸,可称“成都经大理入缅甸沿伊洛瓦底江出海道路”。第三条经今四川宜宾、云南昆明和云南蒙自至越南河内,再经海防出海达地中海沿岸,可称“成都经宜宾、昆明、蒙自至越南北部出海道路”^[1]。

丝绸之路是沟通中国与其他国家重要的交通线,在中国的路段也是边疆地区的交通动脉。鉴于

中国历史疆域有一个变动及最终形成的过程,古代中国与邻邦的接界区域也常常变动;在上述地区的经济开发与社会发展方面,丝绸之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西南丝绸之路在中国边疆及其相邻区域做出的贡献,同样属于沟通亚欧地区古代文明交流的一个部分。进一步来说,南方丝绸之路对中国、中南半岛与印巴次大陆间文明的沟通,其贡献可能大于中国与欧洲文明间的沟通。

西南丝绸之路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相关道路的发展与经营,丝绸之路与中国边疆的形成,中国与亚欧地区的商贸往来,中国与东南亚、南亚间人口的迁移,中国与亚欧地区的文明交流,道路所经地区相关城市的形成,南北方与海上丝绸之路传播亚欧文明的比较等。丝绸之路的拓建与兴衰,不仅受到社会发展、商贸活动、经济开发等因素的影响,与中原王朝治边的思想与方略、邻邦的政局以及邻邦与中国交往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对历代王朝在其政治生活中与国际通道有关的治边、邦交、用兵与结盟等方面的情形,也应进行深入研究。

通过西南丝绸之路,历代王朝与亚欧地区进行

收稿日期:2014-05-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18UZD122)

作者简介:方铁(1949-),男,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四川大学客座教授,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物质、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其中既有普通商品、珍稀物品和生产工艺等方面的商贸交流,也有宗教、艺术、科学等方面的双向传播。受社会发展程度、时代风尚等影响,在不同时期,这些交流活动有各自的重点和主流,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也不可等量齐观。

受西南边疆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与复杂多元的民族文化的影 响,西南丝绸之路表现出与北方丝绸之路不同的特点,如虽以若干要道为主线,但旁道和叉道众多,道路的兴衰更替明显,道路的功用复杂多样等。同时,古代中国的发展过程漫长且未发生断裂,各地国际通道的开通、运营和功能等又受到历代王朝治边与邦交关系的深刻影响,使南方、北方与海上的丝绸之路具有明显的共性,也提醒我们须注意南方、北方与海上的丝绸之路的异同及其内在联系。这3种类型的丝绸之路既有相互间制约与消长的关系,也有相互间配合,乃至形成国际性回环线路的关系。

对北方丝绸之路与亚欧古代文明的交流,迄今已有不少成果;但对南方丝绸之路与亚欧古代文明的交流,目前知之甚少。究其原因,一是历代王朝治边的重点在北方,相关的事迹和记载较多;二是南方潮湿多雨,相关的木札、文献和遗物等难以保存,在运行的条件以及承载移民和商队等方面,南北方丝绸之路可能也存在差异,诸多原因使南方丝绸之路的知名度不高,也反映出对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尚待加强。

一、西南丝绸之路的变迁

(一) 成都经西昌、大理入缅甸至印度道路

这条道路有关记载始见于汉代。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元狩元年(前122),张骞出使大夏(在今阿富汗北部),在当地见到蜀布和邛竹杖,推测有道路由今四川经云南达印度。考古材料证明,这条道路在汉代以前已存在。1975年,在春秋晚期的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一颗蚀花肉红石髓珠,这种石珠产自印度河流域和西亚一带。在晋宁石寨山7号墓,还发现了一件从印度传入的有翼虎图形银带扣^[2]。

汉武帝得到张骞的报告后,遣使者寻觅通往身毒国的道路,在滇国(中心在今云南晋宁)以西被昆明部落所阻。元封二年(前109)和六年,西汉两次对昆明部落用兵,在滇国的协助下终于打败昆明部

落。以后,汉武帝又在今永平、保山一带置嵩唐、不韦两县,整修了由大理至保山被称为“博南山道”的道路。魏晋时此道保持畅通。因货物从身毒和身毒以西诸国运抵永昌(今云南保山),《魏略·西戎传》说:“永昌出异物”^①。蜀汉曾在永平以西的澜沧江渡口建竹索吊桥,唐代此桥仍存。

唐朝与西亚诸国的交往十分活跃。为保持此道的畅通,唐于贞观时对道路所经地区的松外叛蛮用兵。贾耽述安南通天竺道西段(即汉代的西至身毒国道)的走向甚详:由羊苴咩城(今大理)西至永昌,渡怒江达诸葛亮城(在今腾冲东南)分两道:一道经乐城、悉利城、突旻城至骠国,西渡黑山,至东天竺迦摩波国(今印度阿萨姆邦西部高哈蒂一带),又西北渡迦罗都河至奔那伐檀那国(中心在今孟加拉国拉吉沙希及波格拉一带),又西南至中天竺国东境恒河南岸羯朱温罗国(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及伽耶一带)。另一道从诸葛亮城西至弥城,达丽水城(在今缅甸密支那以南),西渡丽水、龙泉水至安西城(今缅甸北部孟拱),西渡弥诺江至大秦婆罗门国,又西渡大岭,至东天竺北界个没卢国(在今印度阿萨姆邦西部),西南至中天竺国东北境奔那伐檀那国,与骠国往婆罗门(指今印度、斯里兰卡地区)路汇合^②。

宋熙宁七年(1074),四川商人杨佐受命至大理国联系买马。他在大云南驿(在今云南祥云县)见驿前有里堠碑:“题东至戎州,西至身毒国,东南至交趾,东北至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悉著其道里之详,审询其里堠,多有完葺者。”^[3]可见宋代西至身毒国道仍通行不辍。

元朝在云南建立行省,在中庆(治所在今昆明)经大理达腾冲的道路设驿站。元代西至身毒国道不仅依然通行,而且通过此道云南与印度的联系还相当密切。明清两代,此道仍是云南联系印度重要的道路。据《明会典》记载,明朝在今保山县西南设蒲缥驿,在腾冲设腾冲驿,由此往西的道路则未见设置驿站^[4]。

(二) 成都经大理入缅甸沿伊洛瓦底江出海道路

近年在云南的晋宁、江川、呈贡与曲靖,以及四川的广汉,贵州的威宁等地发掘的东周时期墓葬中,

① 《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传》注引。

② 《新唐书》卷43下《地理七·下》。此处古地名之今地,据陈佳荣等:《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1986年。

出土了大量用作交易中介物的海贝。据鉴定,这些海贝大都产于缅甸和印度的南部海岸地区,由此推知此道在周代已开通,今云南和缅甸南部已有经济方面的联系。

此道在汉代成为重要的商道。《汉书·地理志·粤地》说,从日南障塞(今越南岘港)或中国两广地区的徐闻、合浦出海,可达谿离国(暹罗古都佛统)。向西陆行十余日,至夫甘都卢国(今缅甸蒲甘一带),走水路航行两月余,可达黄支国(今印度东海岸建志补罗)。从夫甘都卢国沿伊洛瓦底江至出海口,走的就是这条道路的南段。

通过这条国际通道,云南与缅甸中部的骠国、掸国和地中海的大秦(罗马帝国),建立经常性的往来。东汉永元九年(97)、永宁元年(120)和永建六年(131),掸国通过此道3次遣使至汉朝。永宁元年,随掸国使者入汉的还有一个大秦的杂技团。袁宏《后汉纪》记述此事时说:“自交州塞外檀(掸)国诸蛮夷相通也,又有一道与益州(今云南)塞外通。”《魏书·西域传》也说,大秦“东南通交趾,又水道通益州”。

南诏对中南半岛地区多次用兵。唐代宗时,南诏王阁逻凤“西开寻传,南通骠国”^[5]。“寻传”指今云南德宏地区和毗邻的今缅甸克钦邦。唐文宗时南诏再度出兵骠国,攻破位于伊洛瓦底江中下游的弥诺国和弥臣国,并进攻昆仑国(今缅甸萨尔温江口)^[5]。在今缅甸北部,南诏还建置一些城镇,如位今缅甸八莫的苍望城。在南诏统治时期,此道成为南诏联系中南半岛的交通动脉。据《旧唐书·西南蛮传》记载,骠国“北通南诏些东城界,东北距阳苴咩城六千八百里”,堪称是上述情形的写照。

宋代此道仍是重要的国际商道。云南驿的里墩碑将“南至海上”的道路与西至身毒、东南至交趾诸道并列。据《南诏野史》,宋崇宁二年(1103),经今缅甸北部的“缅人”,在今缅甸勃生一带的“波斯”和地处萨尔温江口的“昆仑”,向大理国“进白象及香物”^①,此三国进贡走的就是南至海上道。大理国与海外大秦诸国,通过此道亦继续保持贸易往来。宋人吴曾说:“大秦国多谬琳、琳玕、明珠、夜光璧,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异物。”^[6]

元朝攻破位于今缅甸北部的缅国,在南至海上道的上段设置驿站。至元七年(1270),云南官府在大理至腾冲一线设置驿站^②。至元十一年云南行省建立后,加强了对今缅甸北部的经营。据《元史·缅传》记载,至元十四年将领纳速剌丁率元军

至江头城。据《元史·世祖七》,至元十六年纳速剌丁再次沿旧道入缅,招降村寨并设置驿站。至元二十年,诸王相吾答儿等率军征缅,攻破江头城以兵守其地,继而水陆并进攻克太公城(今缅甸拉因公)。元朝在江头城一带置驿站,当不晚于至元二十年前后。至元二十六年元朝在太公城设太公路,江头城至太公城的道路亦有可能设置了驿站。

至元二十四年,云南王与诸王率军征缅,最终攻克缅甸的都城蒲甘^③。缅甸的政治经济中心和南至海上道的枢纽原在卑谬。卑谬于八九世纪毁于战火。随后蒲甘崛起,于11~13世纪成为“全缅之京都”。蒲甘位于伊洛瓦底江与弥诺江交汇处附近,“故自云南至阿萨密之商业路线,或系在此处与掸国之商业路线相衔接。”^[7]元朝深知蒲甘的重要性,攻克后即蒲甘地区驻扎重兵。在蒲甘以下的伊洛瓦底江河段亦遣兵戍守,甚至远至卑谬以南的多卢多(Taro Kmaw)^[7]。元军占领蒲甘、卑谬及其以南的地区,标志着元朝对南至海上道全程实现了有效的控制。

明代此道仍保持畅通。通过这条道路,中国西南地区与海外诸国建立了经常性的经贸交往。由云南德宏地区沿伊洛瓦底江出安达曼海,可至佛大国(今泰国北大年)、阿育国(今印度)、大秦国、伽卢国(在今印度中部)。

(三) 成都经宜宾、昆明、蒙自至越南北部出海道路

此道最早的记载见于东汉。建武十九年(43),伏波将军马援奉命征交趾。据《水经注·叶榆水》,马援从麋冷水道出进桑,至益州贲古县(治所在今蒙自县东南)。马援行经并以此运输军粮辎重的道路,因经过进桑关而称进桑道。进桑道的走向,是从滇池地区南下至今蒙自,沿红河经今屏边达越南河内。另据《汉书·地理志》,进桑县于西汉时已设进桑关,以控扼红河水道航运,可知至迟西汉时进桑道已开通。

唐代称由交趾经云南达天竺的道路为“安南通天竺道”,这条道路的东段即汉代的进桑道。《新唐书·地理》述其走向:从交州(今越南河内)经太平至峰州(今越南白鹤县南风),又经南田达思楼县,水行40里至忠城州(今越南富寿),又至多利州(今

① 倪谔《南诏野史》段正淳条。

② 《永乐大典》卷19417《十二·勘·站·站赤二》,引《经世大典》。

③ 《元史》卷210《缅传》。

越南安沛)、朱贵州、丹棠州,至古涌步(今越南河口县西北)入云南境,经十余站至拓东城(今昆明)。大理国时,由今昆明经蒙自至河内的道路,仍是云南联系海外诸国的重要商道,云南驿保存的里墩碑记载了称为“云南至交趾”的道路。

元朝攻据云南地区,此道也是最早复开的道路之一。宪宗七年(1257),兀良合台率军进攻安南,至其都城大罗城(今越南河内),后师还押赤城(在今昆明)^①。此次行走的即是自云南入安南旧道。数月后南宋所遣谍探报:“敌(按:元军)介间到交(趾)境,或谕修路,或索执俘。”^②表明元军已着手修复大罗城至押赤城的道路。通过云南入安南的道路,安南与元朝建立密切的联系。至元十一年(1274),元朝在云南建行省,云南的政治中心从大理迁至中庆(今昆明)。中庆至大罗城的道路进一步成为重要的国际通道。次年,元朝敕安南使者“以旧制籍户、设达鲁花赤、签军、立站、输租、岁贡等事谕之”^③,遂于中庆至大罗城的道路设置驿站。中庆至大罗城的道路,乃成为元朝与安南往来的通衢。

据《元史·地理四》记载,至元十三年元朝改蒙自为县,以其地近交趾,遂于舍资(今蒙自以东)设安南道防送军千户,隶于临安路。可知由中庆达大罗城,仍是走唐代的安南通天竺道。从明代记载来看,元明时由云南达越南北部的道路,为经今晋宁、江川、通海、建水至蒙自,又分两道,一道由蒙自莲花滩(今越南河口县西北),另一道经蒙自河阳隘,入安南后分沿洮江(红河)两岸下行,俱会于白鹤三歧江,前行渡富良江达大罗城。循洮江右岸道路地势平坦,为常行大道^④。至元二十二年,元朝沿邕州(今广西南宁)经永平寨(今越南谅山东南)至大罗城的道路遍置驿站,驻军戍守^⑤。以后,邕州驿道成为元朝联系安南的首选通道。但迄元末明代,云南至安南的旧道仍行旅不绝。

二、西南丝绸之路的修建与管理

历代王朝为建设西南丝绸之路作出了重要贡献,尤以汉、唐、元三朝最为突出。

西汉建立后的60余年忙于抵御匈奴,乃暂弃西南夷(今云贵、川西地区)。文景之治后,西汉的国力明显增强,武帝开始关注南方。西汉几次经营西南夷,均与其地的交通线有关。或者说西汉经营西南夷的主要原因,是武帝企望开通自夔道沿牂柯江

(今北盘江)达番禺(今广州)的用兵通道,以及自蜀地经西南夷、身毒达大夏的国际通道。

为修筑由成都南下邛都(今四川西昌)的道路,西汉征用蜀地诸郡的租赋,征调了汉中、广汉、巴、蜀四郡的数万民工。元朔三年(前126),朝廷为抗御匈奴建朔方城,因用度浩大及西南夷屡反,武帝诏罢西南夷之事^⑥。元狩元年(前122),张骞出使大夏归来,奏有道路自蜀经西南夷、身毒达大夏,并说由羌中道路出使大夏甚险,走蜀通身毒道近且无寇。武帝乃复事西南夷,但未找到西南夷至身毒的道路而罢。

元鼎五年(前112),西汉第三次经营西南夷。其年南越反,西汉遣军平之。汉军随后平定西南夷诸部,置益州、越巂、牂柯、沈黎、汶山诸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⑦。元封六年(前105)以后,武帝对抢劫汉朝使者的巂、昆明部落再次用兵,将之打败并将其活动地域并入益州郡。汉军还击败居今滇西的哀牢夷,终于开通渡兰沧水(今澜沧江)、经身毒至大夏的道路。西汉不仅找到经西南夷达身毒的道路,还征用大量士卒和民夫修整这条道路,留下了他们抱怨修路辛劳的歌谣:“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渡澜沧,为他人。”开通此道时《史记》或已杀青,有关史实因此未能载入^⑧。

东汉继续经营蜀身毒道。永平十年(67),东汉增设益州西部都尉,治犒唐(今云南永平西北)。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率部众55万余人归属,东汉在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附近的六县合为永昌郡,治不韦(今云南保山)^⑨。永昌郡是东汉的大郡,辖今祥云以西云南省的西部与西南部,以及相邻的缅甸东北部。设置永昌郡后,经西南夷入今缅甸至印度,以及经西南夷南下沿伊洛瓦底江出海,沿途的障碍得以消除。

东汉建武十九年(43),伏波将军马援奉命征交趾,利用了西随(治所在今云南金平县境内)至交趾(治所在今越南河内)的水陆道路。据《水经注·叶榆水》,汉军在道路沿途进行整修,还在今红河上设进桑关。以后历代行走进桑关道,大致是沿袭东汉所开的水陆通道。

① 《元史》卷121《兀良合台传》、卷209《安南传》。

② 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5《安南求援奏》。

③ 《元史》卷8《世祖五》。

④ 《元史》卷209《安南传》。

⑤ 《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

⑥ 《后汉书》卷86《西南夷传》,《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

以安史之乱为临界点,唐朝对今云贵地区的经营分为前后期。唐朝前期经营其地十分积极,有效控制区域从前代的今川西南、滇东北与滇东,发展到今滇西、滇南、滇西北与黔西北等地。南诏壮大后与唐朝产生矛盾。天宝九年(750)南诏与唐朝的关系彻底破裂。唐朝三次出兵征讨失败,随即发生安史之乱,今云贵地区遂被南诏割据。唐朝前期经营今云贵地区的档案已佚,但唐朝对云南道路的修整和管理,从零星记载仍可知其端倪。

由成都经今汉源、西昌等地至大理的道路,在唐代称“清溪关道”。据《蛮书·云南界内途程》:自成都达南诏都城阳苴咩城(今大理)有2720里,其中由成都至嵩州(治所在今西昌)俄准岭有30驿,为唐西川节度使管辖的地界。俄准岭以南至阳苴咩城为南诏的辖界,共设菁口、弄栋、云南、龙尾等19驿。目前未见南诏有修整道路的记载,推测上述驿站为唐朝所置。唐初至天宝战争唐诏失和,清溪关道是内地联系云南主要的交通线,唐人高适说:“剑南虽名东西两川,其实一道,自邛关、黎、雅,界于南蛮也。”^①

从戎州(今宜宾)经今滇东北至拓东城(今所在昆明)的道路,在唐代称“石门关道”。在戎州以南的石门,现仍存隋开皇五年(585)刊刻通道的摩崖,唐人说石门安梁石孔为隋朝所凿,证明隋朝对石门关道有过一次大规模的整修^[5]。贞元十年(794),唐廷拟遣使册封南诏主异牟寻,时传说吐蕃将阻断清溪关道,西川节度使韦皋乃整修石门关路,并于沿途设置一些驿馆^②。以后唐使袁滋至南诏册封,即经修整后的石门关道。据《蛮书·云南界内途程》载,由戎州南下第九程至马龙县制长馆:“始有门阁解字迎候供养之礼,皆类汉地。”由安宁西行至阳苴咩城,沿途有龙和、沙雌馆、曲馆、沙却、求赠、波大、白崖、龙尾诸处驿馆,这些驿馆均为唐朝前期所建。

唐朝十分重视由交趾经云南的道路,将之与大理至天竺(今印度)的道路相接,称为“安南通天竺道”。贞元间的唐朝宰相贾耽,称安南通天竺道为入四夷七要道之一。《蛮书》叙述该道的走向十分详细,甚至记载云南境内每日宿营的地点。这些地点大致相距30里,也与唐朝30里置一驿的制度相符。相关记载多称沿途宿营之地为“驿”或“馆”,表明当地设有驿馆。云南境内的驿馆大致有:古涌步(今河口县)、浮动山、天井山、汤泉州、禄索州(今屏边县)、龙武州、悦迟顿(今蒙自县)、八平城、洞澡水(今开远市)、南亭(今建水)、曲江、通海(今通海)、

晋宁(今晋宁)、拓东城(今昆明)、安宁故城(今安宁)。

天宝四年(745),唐朝拟开通自安南都护府经步头(今建水)、安宁达戎州都督府(今宜宾)的步头路,唐朝越嵩郡都督竹灵倩,奉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之命至安宁筑城。此举引起地方势力爨氏白蛮的猜疑,杀死竹灵倩并毁安宁城。玄宗诏南诏进讨。南诏随后占据今滇东地区,拟建步头路之举无功而终。

元朝极为重视云南行省交通设施的建设,修建多条云南通往外地的交通线,设置驿传的道路便达约十条,其中西南丝绸之路是置驿的重点^[11]。情况大致如下:至元十九年(1282),元朝重开清溪关旧道,并沿此道设24处驿站,开通后以建都(今西昌)为枢纽联系滇蜀两地。自至元二十八年开通普安达黄平的道路,因清溪关道地形复杂险阻迭见,以后由内地赴云南,主要是走普安达黄平道,元廷在清溪关道裁减驿马500余匹、站丁15000余人^③,此路不再是云南联系内地的主要道路。

元朝在中庆经乌蒙(今昭通)至叙州(今宜宾)道设驿。此道大致沿袭石门关旧道,元朝增加若干支道并置驿站。至元十三年后,元朝开通此道并设水陆驿传^④。由中庆赴乌蒙有两道,一道由今昆明经杨林、马龙、沾益等11站达昭通;另一道从今昆明经杨林、会泽等7站至昭通。汇合后经今四川之盐津、高县庆符诸站进抵叙州。至元二十八年又开通由叶稍镇至庆符设五站的新路,由乌蒙达叙州还可走金沙江、横江两条水路^⑤。普安达黄平的道路开通后,云南的物资仍可由乌蒙经水道运往四川。

元朝在中庆经大理至缅甸道设驿站。至元七年(1270),元朝于中庆至大理的道路,设安宁、路品、禄丰、舍资、路甸、威楚、禄葛、砂桥、普润、普棚、小云南、白山石、河尾关、样备、打牛坪、永平、沙磨和、永昌、腾冲等19处驿站^⑥。自大理南下有两种走法,其一由今大理经保山、腾冲入缅甸北达印度;其二自永昌(今保山)经金齿(今云南德宏)达江头城(今缅甸)

① 《旧唐书》卷111《高适传》。

② 《资治通鉴》卷234《唐纪五十》贞元九年,《蛮书》卷1《云南界内途程》。

③ 《永乐大典》卷19417《二十二·勘·站·站赤二》;《永乐大典·站赤四》,《永乐大典》卷19423《二十二·勘·站·站赤八》;《永乐大典》卷19418《二十二·勘·站·站赤三》,引《经世大典》。

④ 《元史》卷122《爱鲁传》。

⑤ 《永乐大典》卷19419《二十二·勘·站·站赤四》,引《经世大典》。熊梦祥撰《析津志·天下站名》。《元史》卷16《世祖十三》。

⑥ 《永乐大典·站赤二》,《永乐大典·站赤八》,《析津志·天下站名》。

甸杰沙),再经今拉因公、新古、曼德勒抵蒲甘,沿伊洛瓦底江南下至勃固,往西南经孟加拉湾出海。所经道路设驿站的情形参见前述。

中庆经蒙自至安南的道路,走向为自今昆明经晋宁、江川、通海、建水至蒙自县八甸,南下至安南大罗城。至元十二年(1275),元朝敕安南“设达鲁花赤、签军、立站、输租、岁贡等事”,遂沿此道设置驿传。次年,元朝又于舍资(今蒙自以东)设安南道防送军千户^①。此道至蒙自后分为两道,经水或陆路抵达大罗城^[8]。

云南行省大量签发云南诸族为站户,分派各地驿站当役。元代惯例,站户所种土地四顷可免税,其余部分须纳地税。一些供应过往使臣饮食份例的站户,可免除和雇、和买与杂泛差役。驿马通常由官府购买或由站户购置,若死亡则由站户赔补。云南行省在执行上述规定时有所变通,以减少站户的负担。元朝规定,乘驿(获得与驿传有关的服务)须持有凭证“驿传玺书”,若有紧急军务则以金字或银字圆符为凭,驿传玺书与圆符由朝廷发给。“于是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

三、西南丝绸之路的利用

中原王朝修建西南丝绸之路的首要目的,是为海外诸国朝贡提供便利。为彰显实力,发挥文化的影响力,并对远方的夷狄广施德化,中原王朝十分重视吸引海外诸国前来朝贡。以元代为例,在元朝统治的近百年间,元朝遣使至缅甸10次,缅甸入贡、遣使至大都30次,缅甸向元朝贡驯象9次,总计象50头以上;元朝遣使至占城7次,占城遣使、贡物21次,元朝遣使至安南44次,安南遣使至元朝及进贡63次。据《元史·安南传》,至元十二年(1275),安南国王陈光昺上表元朝,请罢本国达鲁花赤并说:“自降附上国(即元朝,笔者注),十有余年,虽奉三年一贡,然迭遣使臣,疲于往来,未尝一日休息。”由此可见当时朝贡之盛。

向海外广泛收集珍宝异物以供统治者享受,是中原王朝修建西南丝绸之路的另一目的。据《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永昌郡(治所在今保山)盛产铜铁、铅锡、金银、光珠、虎魄、水精、琉璃、轺虫、蚌珠等珍物。其中一些来自永昌以外的地区,如蚌珠主要产自今缅甸丹老海岸。《魏书·西域传》记载,大秦东南通交趾,有水路通益州(治所在今成都):“永昌郡多出异物。”班固说,自西汉开拓四夷,“明珠、

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班固所说的明珠、文甲、通犀、翠羽等异物便是来自东南亚等地。

随着商品经济渐趋活跃,西南丝绸之路成为重要的国际商道。云南与佛大国(今泰国北大年)、阿育国(今印度)、伽卢国(今印度中部)、大秦国(今地中海东岸)诸国均有贸易往来。据《蛮书·南蛮疆界接连诸番夷国名》记载,位于今缅甸中部的骠国,以江猪、白氈、琉璃、罽与南诏相贸易。通过西南丝绸之路,南诏与大秦婆罗门国(今印度阿萨姆至恒河一带)、小婆罗门国(今印度阿萨姆西部)等也有往来。据《南诏野史》记载,宋崇宁二年(1103),居今缅甸北部的缅人、居今缅甸勃生的波斯、居今缅甸萨尔温江口的昆仑,分别向大理国进贡白象、香物等物,他们走的就是“南至海上”道。据《岭外代答》记载,南亚地区著名的王舍城、天竺国与中印度,与大理国也有联系往来。据到过云南的马可·波罗说,元代大理一带出产良马,“躯大而美,贩售印度”。

辗转于西南丝绸之路上的商贾,既有来自内地或异国的商队,也有大理等地的大小马帮。他们从永昌到腾冲及其以西地区贸易,必经连绵高大的高黎贡山。冬天山顶积雪严寒,秋夏山下盆地毒暑酷热,一驿位山腰,一驿在山巅,拂晓马帮从怒江边登山,迟暮方达高黎贡山顶,河赋(今大理)羁留寻传(今德宏)的商客乃作歌:“冬时欲归来,高黎共上雪;秋夏欲归来,无那穹赋热。春时欲归来,囊中络赂(钱财)绝。”^[5]

在西南丝绸之路沿线还兴起一些商业城市,永昌为一大都会。据明代记载,永昌之人善制作,以金银、铜铁、象牙、宝石、料丝、竹器、布罽制造的器物,皆好于他处。市场还多见他国所产的琥珀、水晶、碧玉、古喇锦、西洋布与阿魏、鸦片诸药物:“辐辏转贩,不脛而走四方。”腾冲的商业十分繁盛。内地商人经腾冲至缅甸经商,沿途络绎不绝,缅甸岁收商税达数十万^②。清嘉庆、咸丰年间,大理一带出现三元、裕和等大型商号,光绪初年形成四川、临安、迤西三大马帮,在云南与缅甸等邻国间来往贩运。

明代缅甸的江头城有商市大明街,常年有闽、广、江、蜀各地的商人及游艺者数万人,三宣六慰诸土司家属逗留其地亦有数万。大明街有12门,为避

① 《元史》卷8《世祖五》、卷61《地理四》。

② 龙云总《新纂云南通志》卷143《商业考一》,刘昆《南中杂说》。

免拥挤造成混乱,规定入东门者东出,入西门者西出,南北皆如之,出入不由故道者受罚。行 30 里可至摆古等温城。商市周围有走廊 3 000 余间,以避天雨^[12]。伊洛瓦底江中停满由闽广北上的海船。正统年间,大明街在麓川战乱中被毁。

明清时期,宝石、翠玉成为缅甸商品中的大宗。据《万历野获编·滇南宝井》:缅甸的孟艮、孟养诸夷俱产宝石,“惟孟养所出称最”。各井所出色类不一,价格亦悬殊,“有铢两即值千金者”。《滇略·产略》记载,宝石产自缅甸的猛密和木邦:“及永昌以西皆有之,生山坳溪间注水之所,谓之宝井,色类不一,值亦悬绝。”据清代《幻影谈·杂记》记载,缅甸产翠玉、碧洗、各色宝石、琥珀、象牙、缅甸燕、缅甸刀与缅甸布,种类繁多:“腾越、永昌商人往来其地,贩运入滇。”缅甸出产的宝石与翠玉,明清时大都销往各地市场。清人张咏《云南风土记》记载,大理地区的点苍山之麓,每年三月举办盛大集市,延袤达数里,有不远千里赴市者。市上买卖皆珍异之物,如宝石、琥珀、翡翠、玛瑙、车渠、赤金、珍珠、风磨铜、缅甸锡、缅甸锦、法琅、走乌白铜、象牙、象尾、五色石等,销售的鸟兽有孔雀、锦鸡、鹦鹉、秦吉了、桐花凤、麝鹿、香狸、獐与兔,成交商品日以万计。

四、结语

总体上来看,在古代的前半期,拓建内地经云南联系外邦的交通线并力保畅通,是历朝经营西南丝

绸之路的主要动力。随着西南边疆的逐渐形成,以及边疆经济的发展与资源的开发,云南本地及其联系相邻诸省的交通线,其重要性逐渐超过通往外邦的交通线。西南丝绸之路的功能也发生了从主要用于朝贡、遣使和用兵,向重在满足物资转运与商贸活动需求的转变。

参考文献:

- [1] 方铁. 边疆民族史新探[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
- [2] 张增祺, 王大道. 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 1975(2): 97-180.
- [3]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 [4] 杨正泰. 明代驿站考[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 [5] 樊绰. 蛮书[M]. 北京: 中国书店出版社, 2008.
- [6] 吴曾. 能改斋漫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7] G. E. 哈威. 缅甸史[M]. 姚梓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7.
- [8] 邓钟. 安南图志[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6.
- [9] 方铁. 《史记》、《汉书》失载西南夷若干史实考辨[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31(3): 65-72.
- [10] 云南大学历史系. 史学论丛: 第三辑[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8.
- [11] 方铁. 元代云南至中南半岛北部的通道和驿站[J]. 思想战线, 1987(3): 73-79.
- [12] 朱孟震. 西南夷风土记[M]. 台北: 广文书局, 1957.

Brief discussion on Southwestern Silk Road

FANG Tie

(Center for Studies of Southwestern Borderland Ethnic Minoriti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Yunnan,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mainly three routes in Southwestern Silk Road. One is from Chengdu to India via today' Xichang, Dali, and Burma, one is from Chengdu to Burma via Dali and into the seaway along Irrawaddy River, and the other is from Chengdu to the north of Burma via Yibin, Kunming, and Mengzi and into the seaway. Ancient China dynasties all paid attention to the operation of Southwestern Silk Road, especially Han, Ta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governors is to provide convenience for overseas countries' paying tribute, and dispatching envoys. With the activating of commodity economy, Southwestern Silk Road became an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road.

Key words: Southwestern Silk Road; Central Plains dynasty; paying tribut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road